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中國故事：

文艺形态与文化基点

——以文言小说形态变迁与文化意蕴为中心

李苗苗
张鹏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作 · 者 · 简 · 介 ·

李苗苗 1988年出生，女，汉族，河北深州人。现为河北金融学院人文艺术教育部教师，讲师。201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外文艺理论、小说理论研究，曾在《明清小说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CSSCI来源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张鹏辉 1981年出生，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现为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企业管理。

2020—202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的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及传统文化基点阐释”（项目编号：HB20ZW010）研究成果

中国故事：

文艺形态与文化基点

——以文言小说形态变迁与文化意蕴为中心

李苗苗
张鹏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故事:文艺形态与文化基点:以文言小说 形态变迁与文化意蕴为中心/李苗苗,张鹏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307-21913-7

I.中… II.①李… ②张… III.古典小说—文言小说 —小说研究—中国 IV.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23308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广东虎彩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5 字数:220千字 插页:2

版次: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1913-7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一、“中国故事”系列思想阐释

“中国故事”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首次正式提出,并将其界定为: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之一。随后,习总书记又分别在《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0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014年5月15日)、《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的讲话》(2014年6月6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5日)中重申“要讲好中国故事”。

据此可得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故事”概念的总体界定:从内涵上看,“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载体;从外延上看,“中国故事”指涉及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共各级党组织思想舆论建设、中外文明和文艺交流互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宣介和“中国梦”宣介,而且和“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声音”“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理论”系列概念交叉互渗。

“中国故事”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界的重要概念,由《人民日报》2014年1

月 24 日“文艺观察版”发表的《何谓“中国故事”》一文，也即该报“中国故事”专栏创刊词，首次提出，该文集中解读了上述概念的文艺外延，并认为其核心内涵是：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将“中国故事”概念核心界定在文艺和文化方面后，人民日报评论部又陆续出版《习近平用典》（2015）和《习近平讲故事》（2017）集中对其进行解读。此二作加之五十余篇专栏文章，即形成了围绕“中国故事”概念的系列文艺思想。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提出的直接背景是当前文艺界的“浮躁”问题突出。发挥系列思想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引导作用，以系列思想为指导建设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是当前文艺研究领域的迫切使命。即，将“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成果之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理线索下，阐释其中的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及传统文化基点，并与文艺基本原理对接，用于指导当前文艺创作和评论实践。

具体来说，系列思想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指导作用可细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其内核是“中国故事”概念的最核心内涵——中国文化软实力载体。其前提有二：一是，承认文艺为全体人类共同需要，承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尊重；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观和文艺发展道路不动摇。

其次，中国故事这一中国文化软实力载体的内在根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其传承中介是中国故事承载着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梦。

最后，“讲好中国故事”思想的最直接外化即是习近平总书记惯用的“习式话语”，善讲故事和用典是其两个突出特征，其背后的原理是中国故事体现的中国声音和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的文艺理论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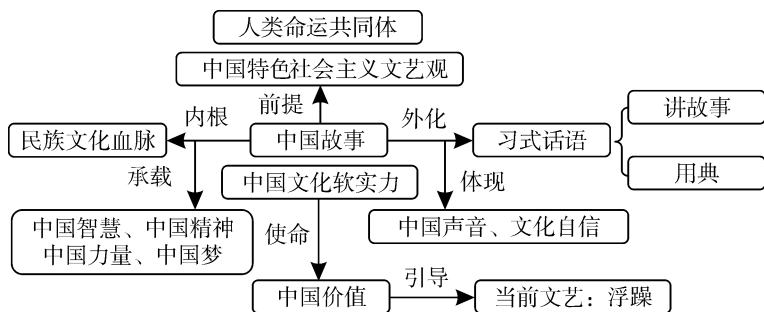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作用示意图

又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到“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具体论述中，他认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厚资源。

其一，讲好“中国故事”，要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精华。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观念中，文艺创作和评论要肩负时代历史、社会生活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在最早集中记录文艺观念的典籍《尚书·尧典》中，记载帝舜认为原始文艺混合体“乐”的功用为“命汝典乐，教胥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是对文艺教育功用的强调。后来《论语·阳货》篇记录了孔子的“诗教”观点：“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处，孔子对文艺在审美、教育、认知、反映社会现实方面的功用给予了极高肯定。“兴观群怨”说成为古代文人对文艺功能的权威界定。后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艺功能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

观点。他强调文艺对个人扬名和治国理政方面的重大作用。以上论述，后经唐代古文运动过渡，至宋代周敦颐将其总结为“文以载道”主张，由此形成了古代文论对文艺社会功用的集大成观念。

和传统文艺观念中对文艺社会功用的强调相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将文艺创作和评论作为自身品格养成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表现出了一股可贵的精神力量。《孟子·公孙丑上》中记载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宋代张载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古代文人自觉承担时代使命，继承尧舜周孔以来的文化传统，规范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人生目标。这是《习近平讲故事》中“品格”“励志”系列故事强调“修其心治其身”重要意义的传统文化基点。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坚毅不屈，肩负使命而拼搏奋斗的坚强品格。

其二，讲好“中国故事”，要继承中华叙述文化传统。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叙述传统中，故事讲述始终以真实反映最广大民众的心声、民意和情怀为主旨。在我国现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先民民谣。这些民谣来自“采诗”，真实地表达了先民们在现实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感受，为政者可据此“知得失，自考正”。《毛诗大序》将这部分积极作用概括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代表了古代叙述传统中对历史进程中民众真情实感的展现。而孟子的“与民同乐”说又将这一传统提升到了文艺评价标准的高度。《孟子·梁惠王下》中提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也就是，以是否真实反映民众的忧和乐，为衡量一切艺术作品的标准。到了唐代，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主张，突出强调文艺和人民间的密切关系。他在《新乐府序》中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这一论断继承了前代叙述传统，重申讲故事要真实反映百姓的生活状况。

这正是“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强烈的人民意识的传统文化基点。“中国故事”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人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国故事”系列思想指导下的文艺创作，应该始终在时代社会结构和历史视野中

反映中国人民的需求和心声。

其三，讲好“中国故事”，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文化发展以“和而不同”的交流融通为中心，以包容精神、和谐精神、世界精神为核心特质。这点，在带有上古文献汇编性质的《尚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尚书·尧典》说尧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说，普天之下都能够得到他的恩惠。这种超越了民族国家利益的天下观念和世界精神，是在中华文化根基处便已确立的精神内涵。在集中记录华夏文化圈先民神话的《山海经》中，也随处可见天人合一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包容的文化精神及其背后的集体意识，最终让华夏文化圈不断壮大，形成了融通各民族文化又兼具凝聚力的中华文化格局。

这正是“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向世界讲述中国”“融通中外”的开放性视野的传统文化基点。也是《习近平讲故事》中讲述大国外交“和为贵”“民相亲”故事的传统文化溯源。

综上所述，“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作为新时代文艺创作和评论的重要指导，正以一种大国包容姿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讲述中国人民的新时代新气象，并将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通中，构筑新的世界与未来。

二、本书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本书集中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学研究领域有关文言小说和“故事”问题的各项成果，以描述法和个案法为主要方法，拟阐释“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的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并选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的故事及其发展流变为系列个案，吸收西方和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故事活动理论，研究故事形态的讲述和传播特点，最终上升至对地域文化中重信守义、勇武任侠等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解读。

本书的最大创新是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故事讲法”间找到了衔接路径。首先，“自上而下”衔接，将“中国故事”系列思想背后的宏观指导

续深化、细化，并与适用于地域文化发展实际的文化理论、艺术理论对接，形成以“故事”和“文化传播”为中心的一套指导“如何讲好故事”的文艺理论。其次，“自下而上”衔接，将关注的具体故事讲述现象集中在有代表性的、经典的故事或艺术作品上，让那些经受住历史考验、获得普遍认可的文艺作品发挥典范价值，从而上升为“好故事是如何讲好的”现象总结。

上述思路的关键点，在于寻找合适的文艺理论资源和经典的文艺作品作为“中介”。但是，目前对“中国故事”和经典文艺作品的研究都未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本书拟在此做出尝试。

本书选择的文艺理论资源“中介”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经典中涉及故事活动的理论资源，同时选择的经典文艺作品“中介”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文言小说这一文艺形态，其代表文言小说创作典范并集中整合古代北方地区民间故事的作品集《聊斋志异》。下面简单评析此二方面的既有资源和选用理由。

先说理论资源。将“中国故事”放置在人类学视野下，即，将“故事”看作为人类用语言讲、听(或书写、阅读)事件的一种本能活动。根据上文对“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阐释，本书将学科定位于文艺学分支之一的文艺理论。所以，此处论及借用的理论资源，也定位于当前中外文艺理论涉及“故事”问题的既有研究和代表成果上：一是，中西方的民间文学研究衍生出的民间故事学，以某民族的民间故事整体作为考察对象，总结其类型、规律、传播等。在西方，以俄国理论家弗·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系列论著为代表；在我国，以多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某民族/地域故事、口头故事相关论著为代表。二是，西方民间文学田野分支研究史诗等口头讲述而衍生出的口头诗学，以诞生于美国的“帕里-洛德理论”，又称“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为代表。三是，中西方的叙事类作家文学研究对“故事”问题的关注。在西方，以经典叙事学重点关注叙事类作品的共同结构特征而形成的“故事语法”理论为代表；在我国，由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中因古人“小说”概念和古小说文体规定性问题而引发了对古代汉语口传和书

写故事的通观考察和文化思考，以“中国叙事学”“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代表。四是，中西方现代以来在文学批评领域涉及故事讲法的论述，以德国批评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论文《讲故事的人》(1933)、美国当代文化学者布克(Christopher Booker)的论著 *The Seven Basic Plots: Why We Tell Stories*(2006)、我国当代作家王安忆的论著《故事和讲故事》(2011)、我国当代作家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2012)为代表。五是，近年中国学者关注文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讲述故事的现象，从跨学科角度出发的综合研究，以刘俐俐的“人类学大视野下的故事问题”系列论著和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为代表。

再说选用文言小说和《聊斋志异》的理由。首先，文言小说是汉语叙述系统中孕育出的典型文学形态之一，也是汉语叙述史上最具独特性的故事形态。因此，文言小说故事形态凝聚着古代汉语文化圈的人文精神和文学造诣。将文言小说形态置于“中国故事”理论视野下考察，将自然延伸出对中国叙事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原理及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传统的讨论。其次，《聊斋志异》是中国传统文艺创作、文言小说文艺形态下的高峰之作，符合前文论述的研究“中国故事”需要的作品经典性和传承时间长两大特征。再次，《聊斋志异》集中了清代北方地区的民间故事，而且传播历时久远，经历了多种艺术样式的改编和演绎。就其传播所涉及的地域文化方面，与上文论述的故事活动视野吻合：一来，这些经典故事正是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二来，研究同主题下故事个案被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等多种文艺形态改编的情况及其当代发展，便可延伸出对不同文艺形态间审美、艺术特点的比对探究，从而上升至对“中国故事美学”的探讨。

综上所述，本书重点考察孕育于汉语叙述系统中的文言小说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从中选取经典的故事个案，以衔接理论视野和考察对象。将“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依照文艺学学理逻辑阐释其中的文艺理论内涵，并将其用于还原孕育于中国故事谱系和汉语叙述系统之中的文言小说形态，实现“中国故事”理论和中国本土故事形态间的互释

互证。

其研究价值至少有以下几点：

在理论方面，其一，以文艺学学科定位阐释“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的文艺理论内涵，即可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二，立足于还原中国本土叙述传统、描述中国本土故事形态，即可实现对本土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实践方面，在“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指导下，还原中国故事系谱、汉语叙述系统及其中的文言小说形态。

一方面回应理论层面，阐释中国故事系谱背后的“中国价值”的历史传承，由此即可延伸出对其当代核心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和弘扬。

另一方面落实到实践层面，挖掘汉语叙述传统和文言小说形态下的优秀故事个案，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这一现实语境进行实践总结，形成“讲好中国故事”方法论，可为全社会、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提供参考，尤其适用于指导当下中国文艺、文化界的话语实践。

本书内容规划为三部分：

上编为理论背景梳理。集中阐释“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第一章集中回顾既往研究成果，并确立“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内核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载体，而承认其存在的前提是，承认文艺为全体人类共同需要，承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尊重，因而选择人类学大视野下的故事活动理论作为主要理论资源。第二章辨析上述理论视野下的两种主要研究范式，确立故事形态学思路，以还原中国故事背后的文化意蕴。

中编为故事形态考察。考察汉语叙述系统的前提是承认讲述—倾听/书写—阅读故事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活动和精神现象。第三章对汉语叙述系统的考察参照人类学大视野下对故事活动的相关界定和规律总结，主要考察汉语叙述发展背后的叙述观念变迁历程，并尝试发掘孕育于其中的历代故事形态演进历程和各自特征。

下编为故事个案分析。第四章、第五章，关注以同一主题为线索的两大组系列个案，共计六百余篇故事，在每组系列个案内部梳理出历时线索，研究每个故事的流变过程和不同艺术体裁间的交叉，同时对在某时间点和文化上形成突出影响的故事进行单独研究，研究其文化影响的形成机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回顾、评析和展望	1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言小说及中国故事相关研究回顾	1
二、展望：文言小说与中国故事研究的当前困境与未来方向	28
第二节 研究思路：理论资源、方法论	38
一、主要理论资源——人类学大视野下的故事活动理论	38
二、方法论	40
第二章 系统观视域下的叙事/故事研究范式评析	44
第一节 广义叙述学研究范式评析	44
一、引入：广义叙述三层次论的遗留问题	44
二、广义叙述学及其三层次论的价值和局限	46
第二节 故事形态学研究范式评析	50
一、故事形态学范式对上述局限的补正	50
二、故事形态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层次	56
第三章 中国古代故事的叙述观念：传统与变迁	66
第一节 叙述观念及书写—阅读故事的传播特点	66
第二节 中国古代故事的叙述观念变迁历程	69
一、先秦至两汉：“记事”即“纪史”	69

二、魏晋南北朝：“纪实”和“纪奇”	73
三、隋唐五代：从“纪”到“写”	84
四、宋元：“写奇”	91
五、明：“实”与“奇”的辩证	98
六、清中前期：“写奇”以“写实”	105
七、晚清：多元观念确立	112
第四章 故事形态变迁个案分析：继承与流变	118
第一节 文言写狐小说与汉语故事思维变异	118
一、汉语狐故事与《聊斋志异》写狐小说	118
二、进入《聊斋志异》的汉语狐故事思维资源	120
三、《聊斋志异》狐故事思维变异	125
四、《聊斋志异》狐故事审美变异	129
第二节 鸬鹚故事的主题源流与文言小说故事问题思考	134
一、主题学对于文言小说故事问题研究的借鉴意义	134
二、《聊斋志异·鸬鹚》故事主题源流追溯	136
三、系列故事之结构与意味分析	137
四、文言小说故事问题思考	143
第三节 狐作祟故事与文言小说和古代白话小说形态交流分析	145
一、《聊斋志异》与《平妖传》系列狐作祟故事形态发展分析	145
二、文言小说与古代白话小说形态生成与演进中的两次交叉	162
第五章 故事文化意蕴个案分析：发展与变异	175
第一节 狐女故事流变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	175
一、狐女故事形态演进中的三个重要节点	176
二、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文言小说形态发展的影响和互动	178
第二节 “直隶”狐故事分析与地域文化传统的生成和演变	192
一、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中三则“直隶”狐故事形态分析	192

二、“直隶”狐故事结构特点及文化意蕴分析	200
三、故事背后的地域文化传统分析	206
附录：本章搜集狐故事篇目例举	210
后记	23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回顾、评析和展望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言小说及中国故事相关研究回顾

(一) 研究状况分期回顾

现代学术界习惯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源头追溯到1923年。这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北大中文系小说史课程教材出版。书中“二十二篇”将《聊斋志异》作为“清之拟晋唐小说专集之最”列出，并简单介绍其作者、版本、评点、仿作情况，且对《狐谐》《黄英》《马介甫》三篇的叙事手法、思想内涵做出简要评介。《聊斋志异》和文言小说理论研究也于此时初露端倪，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逐步形成规模。笔者搜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60余年的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四个研究阶段，分别评述。

1. 起步奠基期(1949—1978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整体起步的阶段，研究成果集中于小说史和作家作品论两个方面。此时《聊斋志异》研究也停留于史料整理和单篇作品评论的基础阶段。